



# 赵惠文王时期的纪年兵器研究



苏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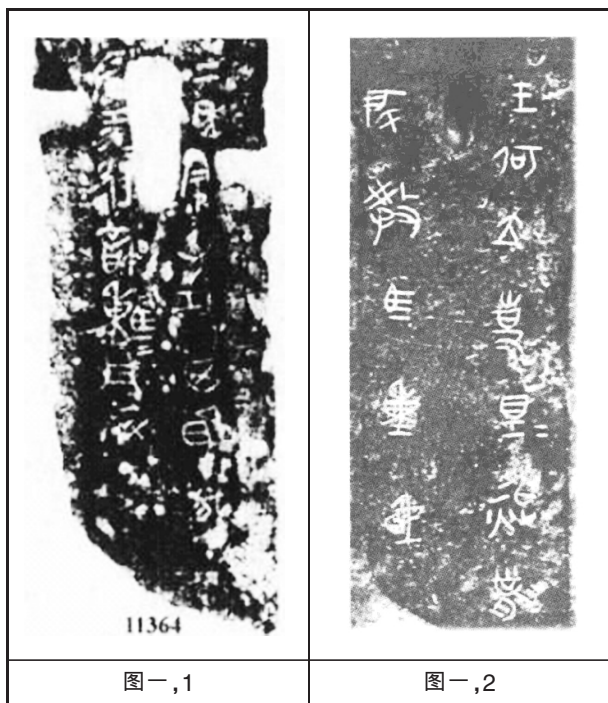
赵惠文王在位三十三年,在赵国中后期执政时间最长,也许是他继位较早。《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十六年才娶孟姚,即王子何的母亲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据此惠文王刚继位时不会超过十一岁。武灵王自号主父,将兵灭中山,掠胡地。惠文王四年,其兄安阳君作乱,主父因为庇护他而被困沙丘宫以致饿死,其后公子成和李兑专政。至于惠文王何时亲政,《史记》不载,但其在位期间,有藁相如、乐毅、廉颇和赵奢等良臣猛将辅佐,赵国国势正隆,参与联合攻齐,阙与之战大败秦军。正如魏牟所言:“驾犀首而骖马服,以与秦角逐,秦当时避其锋”。其间兵事不断,铸造的兵器必定不少,但赵惠文王时期流传下来的兵器不多,偶有发现,辞铭格式也不一致,不过可由学者已经考定的器物来推断其他属于惠文王时期的兵器。下面就是几件标准器:二年主父戈、王何立事戈、廿年丞藁相如戈和廿九年相邦赵豹戈。

## 二年主父戈

李家浩先生在《战国时代的“冢”字》一文中考释出战国文字中的“冢”字,进而讨论铭文含有“冢子”的器物,详实可信,论点确不可移。只是其中引用《三代吉金文存》20.28.1的戈(《集成》编号11364,图一,1),文中释文为:“二年,冢子攻卤明义,左工师邬许,马童丹所造。”“年”下二字是否为“冢子”,从铭文中看似可商。再者,冢子乃一职官名,其后衔接一个职官名,显得比较突兀,也与三晋兵器的辞铭格式颇有不合。韩国的十八年冢子戈和

十九年冢子戈,魏国容器中的二年宁冢子鼎,冢子后都紧跟人名,未见作如此格式。何琳仪先生已经看到从字形上无法将其释为“冢”,故分析此字从宀从主,称作二年宝子戈,并认为“宝”通“冢”。董珊先生则认为“年”后二字为“宝父”,即主父赵武灵王,由此可定此戈年代在惠文王时。内部还有“虎贲”两个字,可知曾为赵国的虎贲所用。其说可从。

“攻”下一字旧释“卤”,其字实从一从止,《小校》已经释为“正”,李学勤先生指出“攻”读为“工”,“工正”乃“工官”之长,是也。《尔雅·释诂》:“正,长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陈公子完避难奔齐,齐桓公先使其为卿,陈完固辞,乃以之为工正之事。杜注:“掌百工之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桓公使为工正。”《正义》:“工巧之长,若将作大匠。”将作大匠为汉景帝时所设,乃承秦之将作少府而来,《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大匠,秦官,掌治宫室”。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汉城遗址发现“将作少府”封泥,陈直先生断为“景帝中六年以前之物”,可证《汉书》之说可信,是将作少府为主修宫室之官,两汉将作大匠也都如此。《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其与本文所论“工正”仍有较大的差距,张守节的比附在此并不妥当。“工正”的职责也不仅限于修宫室,还应包括器械的制造等。《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时)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贍之。……召工官治车诸器。”可见汉代工官职责犹未变,故以杜注为是。戈铭中的“工正”即赵武灵王的工官之长,是兵器的督造者,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所”字后面是



图一,1

图一,2

否有“造”字?从铭拓上看不清。《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隶作“为”,“所为”在赵国兵器铭文中例证,如保利博物馆入藏的两件赵王迁时的铜铍,都有“所为”字样,所以本文取“所为”的释文。

#### 王何立事戈

此戈山西临县永红乡窑头村所出(图一,2),援略上扬,中部起脊,向前与刃相交成锐锋,长胡较狭窄,阑侧三穿,内三面出刃,下边弧刃,上有一长方形穿,内与阑成直角,内上刻铭:“王何立事 冶丛寸所教马重为”。王何便是惠文王何,“立事”也作“位事”,是指在位执政之义,故“王立事”不能理解成王督造,此戈具体作于哪一年待考<sup>①</sup>,应该不出王何亲政的前后几年,为惠文王早期兵器确立了一件标准器。

传世有不少王立事南行唐令铍,分别著录于《周金文存》、《痴蠢藏金》、《商周金文录遗》等,李学勤先生认为都是伪刻<sup>②</sup>,但一定有伪刻所凭据的真品,目前未见。铭首冠以“王立事”字样,与王何立事戈颇类,也应是惠文王时所造。《史记·赵世家》记赵惠文王九年城南行唐,当不早于此年,从辞铭格式看,已是三级辞例,与孝成王时期的辞铭格式类似。《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101 器辞铭格式与之相同,只是令前一字不可识,与王立事南行唐令铍的年代不会相差很远,均属后期的特征。但一称“王何立事”,一称“王立事”,可能王何立事戈为主父尚在世

所造,故强调王何的名字,其余王立事诸器则在惠文王后期,故无须如此<sup>③</sup>。

此器铭中许多文字写法比较特异,如“为”作𠄎,属于三晋的写法,如《集成》编号 4.2482 的四年昌国鼎的“为”字就作此形,又见于保利博物馆入藏的两件赵国晚期的铜铍铭文<sup>④</sup>。《楚帛书》也有同样写法的“为”字<sup>⑤</sup>。

“马重”二字合文,李师已经指出其应是与冶工相近的一种身份,又名列冶工的后面,其身份尚低于冶工,从三晋兵器辞铭格式看确实如此。董珊先生《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认为“马重”即未傅籍的成童。十七年平阳鼎盖有工师名“王马重”<sup>⑥</sup>,《古玺汇编》1144 有“高马重”,2247 有“邛马重”,《史记·项羽本纪》有汉骑司马吕马童,马童即马重,可见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习语。此合文还见于旧称为“十年矢括”之器,即《集成》编号为 18.12032 的“十七年盖弓帽”,当以后称为是,器上刻铭:“十七年阳曲答教马重。”战国币文中的“曲”字由李学勤先生首先释出<sup>⑦</sup>,吴振武先生在此基础上指出“十七年盖弓帽”铭文中的“阳曲”合文即币文中的“阳曲”<sup>⑧</sup>。《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下辖阳曲,地在今山西太原市东北,战国时属赵国,也为李师之说添一旁证。

以上所列是出土文献的资料,其实,作为一种身份的“重”也见于传世文献。《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认为“厮、舆、徒、重”是并列的关系,重读为童,均指奴仆<sup>⑨</sup>。其实,下文“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中的重也当是奴仆<sup>⑩</sup>。《垦令》与赵国器铭中的“重”无疑是同等性质的称谓,字的用法也一致,联系到商鞅来自于三晋的事实,这一点颇值得回味。

按,“童”字《说文·辛部》:“男有鬲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声。”段注:“今人童仆字作僮,以此为僮子字,盖经典皆汉以后所改。……童从疾者,亦取有鬲之意。”清儒汪中在《释童》一篇提到:

知古之罪入于髡者,则以为奴,后则凡为奴者,皆髡钳以自别。髡则纚笄皆无所施,故不冠而谓之童。……“重”又“童”之假借,《说文》之义,无可疑也<sup>⑪</sup>。

汪氏之说至为精当。“马童”之“童”正是此义，指髡髮的刑徒奴隶。裘锡圭先生层引“牧童”、“马僮”、“牛童马圉”、“牛豎马洗”来说明战国时代畜牧业中普遍使用奴隶<sup>②</sup>，“马童”一词当从这而来，久之成为固定用语。故马童应是当时冶铸工场中的官奴<sup>③</sup>，身份尚普通冶工之下，器铭上的排列就是如此。秦国兵器上有城旦、鬼薪和隶臣等官奴徒隶，也是从事冶铸的工作<sup>④</sup>，马童与他们的性质是类似的，这说明当时不仅秦有大量官奴，东方六国也都在使用刑徒来充当廉价劳动力，至少从赵国的情况看是如此。

上文所引《商君书·垦令》的“重”是私家的奴仆，这很容易令人联系到睡虎地秦简中的“敖童”。黄留珠先生结合秦封宗邑瓦书认为敖童为一种奴隶<sup>⑤</sup>，这是正确的。《商君书·垦令》还有“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蒋氏《锥指》引王时润曰：“敖与遨通，谓遨游以避邪官也”。此或即秦简“敖童”之“敖”所本<sup>⑥</sup>，故笔者认为，敖童应指本该傅籍却依附于私家，逃避徭役赋税的奴仆。由此可知，“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傅律》中的相关规定一脉相承。赵器“马重”、秦简“敖童”和《商君书·垦令》中与厮舆徒并列的“重”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相关的问题拟另文探讨。

王何立事戈铭文中没有工师，只表明了铸造机构是“𠄎”，后面出现冶工之名，冶下还有马童，同样是二级的辞铭格式。同一地方铸造的兵器还有几件，如：

七年戈：七年𠄎工或冶左勿

《集成》11271(图一,3)

廿一年镞：廿一年𠄎冶狄

《集成》11996(图一,4)

廿三年秘冒：廿三年𠄎冶刘尧 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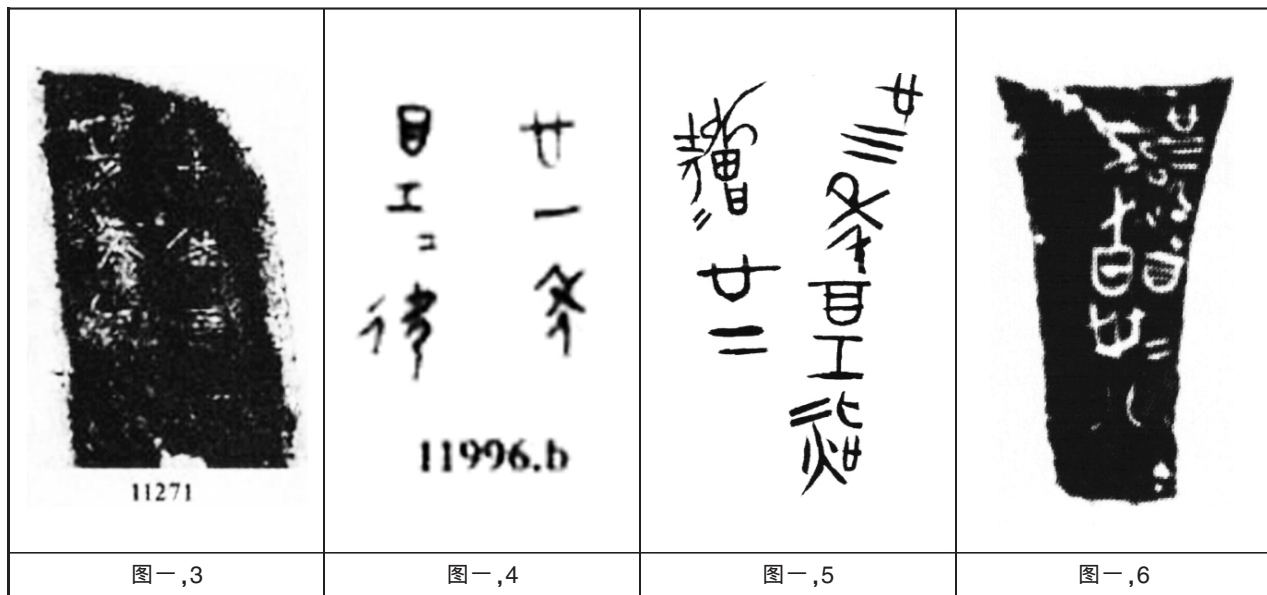
《珍秦斋·三晋》(图一,5)

廿三年秘冒：廿三年𠄎冶古 卅八

《集录二》1340(图一,6)

两件廿三年秘冒形制相同，作顾首的鸳鸯造型，通体鎏金，如出一手，两器铭文除了冶名和编号以外，其他基本一致，完全有理由推断它们是同一批造出的产品，“廿二”和“卅八”是相连的序列号。如果将它们和王何立事戈一起观察作比，可以看到辞铭格式上的一致性，即“□□年𠄎冶□[编号]”，即辞铭格式为年代+铸造机构(地点)+冶(“王何立事”也是一种纪年，与“□□年”相当，戈的冶名下有“所教马童为”格式又已繁化)。因此，综合起来，上述四件器物铸造的年代应该稍早于惠文王，最合适就是在武灵王时。“𠄎”字各家释文均不相同<sup>⑦</sup>，或释为“贡”(《山西出土文物》)，黄盛璋先生《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以为“𠄎”，董珊先生从黄氏之释，认为是赵国宫廷的工官。李学勤先生隶作“贝工”，读为“贡工”(即汉器中的“供工”)。此字仍有待研究，今暂隶定作“𠄎”。

此外，还需提到《集成》11685的七年嗇夫铍<sup>⑧</sup>：“七年𠄎嗇夫廉相如左𠄎工师韩□冶尹朝执剂”，黄盛璋先生根据“𠄎”考订为赵国兵器<sup>⑨</sup>。铭文已经是





规整的三级格式，故年代不会早到惠文王时期，而且与赵王迁时也不相类，由此可知此器的年代上下限，黄氏定在孝成王时期，但也有可能是在悼襄王时所造，其确切年代仍待考。

#### 廿年丞藺相如戈

据《文物》1998年第五期上的简报介绍<sup>③</sup>，此戈1981年在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其形援微上扬，前部稍宽，中部起脊，锐锋，长胡较窄，阑侧三个半圆形穿，内三面有刃，下边弧形，中有一长方形穿，形制与王何立事戈相似，内上刻铭：“廿年丞藺相如邦左麇智冶阳”（图一，7）。两行铭文中闲别刻有“肖（赵）”，援近阑处另刻“相邦”。文中联系藺相如正是在惠文王二十年因参与渑池之会而被拜为上卿，认为此前他可能任丞，归国后拜上卿即担任相邦之职，援部补刻“相邦”当缘于此。董珊先生认为“承”即“丞相”的省称<sup>④</sup>，也可备一说。如果联系《集成》10465三年杖首铭文的中府丞来看，“丞相”是否简称作“丞”还需要坚实的论据，故《简报》所作的推论更可信。此戈造于惠文王二十年，当前279年，可作为惠文王中期的标准器。

此戈的辞铭格式与王何立事戈已经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在督造者和冶工之间多出一个职官，“智”乃其名，“麇”前面一字虽然不可识，但与“麇”连称，以后来的辞例比附，应当是类似主造的工师之职。“麇”也见于中山王器铭<sup>⑤</sup>，均为“麇嗇夫”，作职官名，中山与赵为邻国，制度上必定有相似的地方，颇疑在此也是“麇嗇夫”之省。因此，从惠文王初年到

二十年之间，赵国兵器铭文格式经历了一个提升的转变，从二级过渡到三级，当然，其间两种格式会有一段交错使用的过程，至其在位的后期，辞铭格式已经固定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稳定，下面接着谈到的廿九年相邦戈就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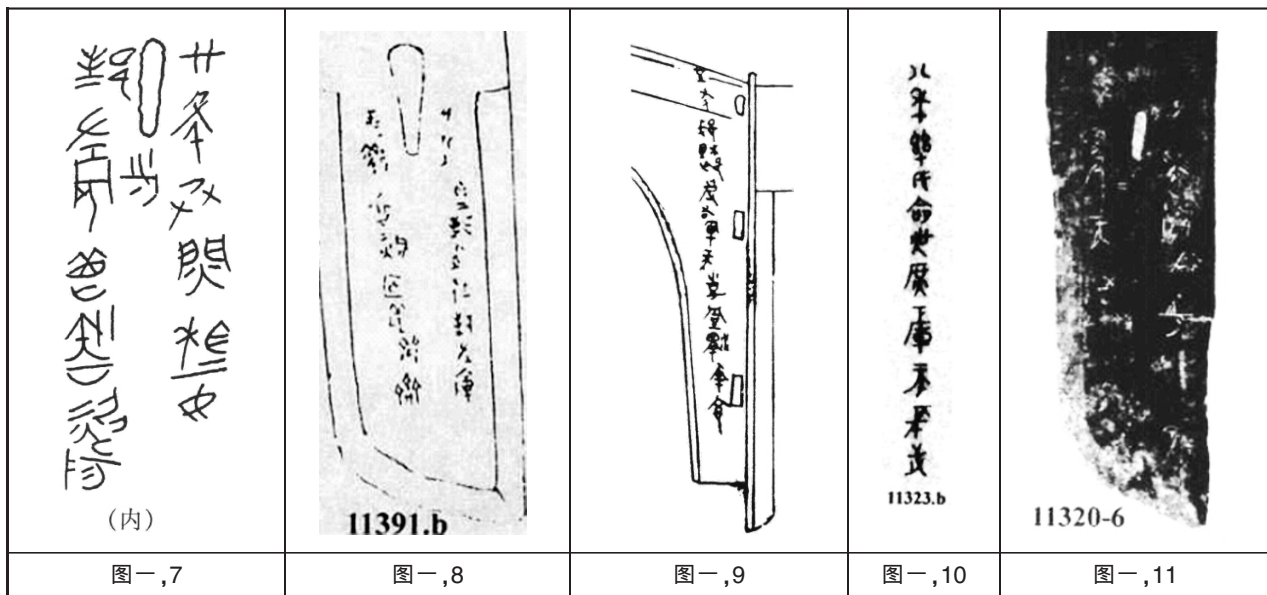
#### 廿九年相邦戈

此戈《集成》编号11391（图一，8），援略上扬，前部较宽，与刃向前收成锐锋，后部微束，中长胡，阑侧三穿，内上一穿，三面出刃，下边弧刃，内上刻铭：“廿九年相邦赵豹邦左库工师藺番冶匡执剂”，铭文“豹”字为吴振武先生释出<sup>⑥</sup>。此戈铭和赵孝成王时期的三级辞铭格式完全一致，但赵国中后期在位年数超过二十九的只有惠文王一人，故此戈造于赵惠文王时无疑<sup>⑦</sup>。可见以工师的出现、督造者一律换成中央的相和地方的县令为标志，惠文王后期辞铭格式已经趋于固定的形式，和赵孝成王时的辞例衔接得天衣无缝，对照前面讨论的王何立事戈和廿年丞藺相如戈，辞铭格式转变的轨迹非常清晰，此前应是这种辞例演变过程的中间环节，由此可以推断下面几件处于这种转变环节中的赵国兵器都属于惠文王时。

## 二

#### 廿三代相邛皮戈

上世纪50年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离石征集<sup>⑧</sup>，器形和廿年丞藺相如戈非常相似。援略上扬，前部稍宽，锐锋，长胡，阑侧三穿，上穿半圆形，下两穿为长方形，内三边出刃，上有一锥形穿，内下



和阑侧有个小缺口,下阑突出。胡上刻铭:“廿三年代相邛皮右库工师吏堂泽执剂”(图一,9)。此戈由代地封君的相督造,工师主造,但没有冶工<sup>③</sup>,排在廿年丞蒯相如戈和廿九年相邦戈之间十分妥当,定在惠文王二十三年造是合理的<sup>④</sup>,且与铭文刻胡上的特征可以相洽。前已论述,惠文王前期的辞铭格式还未固定,其中二级和三级辞铭格式有相互交错使用的一段时间,廿三年戈铭中缺刻冶工之名正表明其时制度执行还不严格,也就是还处于上文提到的过渡时期。

#### 八年兹氏令戈

据黄盛璋先生介绍,此戈出于内蒙境内<sup>⑤</sup>,铭为:“八年兹氏令吴庶下库工师长武”(图一,10),兹氏之名又见于战国币文。根据云梦秦简《编年纪》昭王“二十五年攻兹氏”,与《秦本纪》和《赵世家》当年秦攻赵两城的记载互相对照,确定其中之一即兹氏,故以兹氏为赵地。马非百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sup>⑥</sup>。秦昭王二十五年当赵惠文王十七年,此戈和廿三年邛皮戈的辞例相同,均有令督造,工师主造,而未出现冶工,与廿三年代相邛皮戈同,都是过渡时期的表现,故此器也为惠文王时所造。

#### 六年庠令戈

著录为《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第102器,1972年邯郸所出<sup>⑦</sup>。援略上扬,与内成极小张角,援前稍宽,向前与刃相交成锐锋,后部微收,中长胡较宽,阑侧三长方形穿,下阑突出,内三面出刃,下边弧刃,其上有一长条形穿。内上刻铭(图一,11):“六年庠令肖韩下库工师天□”<sup>⑧</sup>,铭文细如针丝,拓本印得不清,此据李学勤先生的释文。《选集》也有该戈铭的释文,工师下明确空有两个字的位置,李先生将工师下一字补为“天”,为工师之名,并定此戈为赵器,是也。故“天”字后面不可能是“冶”,否则至少应有两个字的位置。如所说不误,“天”下一字也是工师的名,则辞铭格式与八年兹氏戈全同,时间也属惠文王时。此戈形制与上述的廿九年相邦戈、廿年蒯相如戈和廿三年代相邛皮戈并无二致,可见赵惠文王时器的戈形有很大的相似性,尤其是援前部稍宽,向后则微内收,若出一手。再以此戈与王何立事戈相比,后者年代显然要早,铭文中冶工名字后还有马重,六年戈铭中已经不见这些早期的痕迹,也可见前文关于王何称呼的推测并非毫无根据。

“十七年盖弓帽”的铭文中只出现直接制造者,

与工出品纪年超过二十的几件器物铭文有类似之处,以辞铭格式的发展历程而论,无疑要早于包括二年主父戈在内的惠文王时期诸器。此前赵国在位超过十七年的有成侯、肃侯和武灵王,其中以武灵王时最为可能,而且可以推断,有“马重”合文的兵器,都应归入赵国。

### 三

现在可以对惠文王时期纪年兵器的辞铭格式作一总结:在赵国兵器刻铭的演变过程中,惠文王在位的整个三十三年是一非常重要的阶段,由前期形式比较多样的辞例发展到后期严密规整的三级辞铭格式,并奠定孝成王及以后赵国兵器刻铭的一般形式,惠文王时期对赵国后期兵器辞铭格式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更使人欣慰的是,无论是惠文王的前期、中期还是后期都有代表器物流传至今,通过对这些兵器的分析可以探讨各个时期辞例的演变,描述其发展的大体轨迹。(一)惠文王时代中央机构的兵器有两种辞铭格式:1.相邦、丞或工正督造+库(或廙)工师主造+冶(或马童)铸造;2.不显示督造者,只有冶名(或加马童),这是直接承袭自武灵王的制度。(二)前期和中期一些地方县邑的兵器铭文中只出现两级的制造人员,或缺主造工师,或省去冶工,辞末偶有“执剂”,但作为督造者的县令,却绝不见有缺省的情况,虽然他们仅仅是挂名而已,由此可见督造者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性。(三)这些不定的缺省情况也表明其时还处在辞例演变中的过渡阶段,制度执行并不严格,也有可能当时还未形成定制。而且从兵器铭文看,地方和中央的辞铭格式稍有差别,工师在两个制造系统中出现的时间差异就是很好的说明。

最迟到惠文王二十九年这种局面已经结束,辞铭格式的转变与定型就发生在惠文王二十年到二十九年之间。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惠文王时的大多数铜戈器形上比较一致,在判定惠文王的铜戈时可以作为参考。

#### 本文简称列表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1992年
《集录》	《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刘雨、卢岩,中华书局,2002年
《集录二》	《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集》,刘雨、严志斌,中华书局,2009年

注释:

《战国策·赵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

何琳仪:《句吴王剑补释——兼释冢、主、开、丂》,《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后以《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为名发表于《文物》2004年第8期。

张新俊:《二年主父戈补释》,《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

陶正刚:《山西临县窑头古城出土铜戈铭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8期。

⑪ 魏建震以为“王何立事”即以大事系年的计时法,类似齐国铜器和陶器铭文中的“立事岁”,见《“王何立事”戈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⑫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2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⑬ 此点承李学勤师提示,谨致谢忱。

⑭ 《保利藏金》,第273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⑮ 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第259页,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

⑯ 曹锦炎:《十七年平阴鼎盖考》,《考古》1985年第5期。

⑰ 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八辑),中华书局,1983年。

⑱ 吴振武:《谈战国货币铭文中的“曲”字》,《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

⑲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⑳ 全卫敏:《〈商君书·垦令〉篇发微》,《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㉑ 汪中:《汪中集》(卷二),第79~81页,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点校本,2000年。

㉒ 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入氏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㉓ 苏辉:《赵兵器铭“马重”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㉔ 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

㉕ 黄留珠:《“敖童”解》,《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㉖ 张世超:《秦简中同居与有关法律》,《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㉗ 还有一从“目”从“冢”的字,见于《集成》2482四年昌国鼎,何琳仪先生《战国文字形体析疑》隶作“𠄎”,读为“稽”,与“𠄎”不是一个字。𠄎如不作合文写作“𠄎工”,本文一律隶定作“𠄎”。

㉘ 李学勤:《〈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前言》,载《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澳门基金会,2008年。此书承李师惠赠,谨致谢忱!

㉙ 李锦山:《鲁南出土两件铭文铜器》,《考古》1985年第5期。

㉚ 黄盛璋:《关于鲁南新出赵工剑与齐工师铜泡》,《考古》1985年第5期。

㉛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简相如铜戈》,《文物》1998年第5期。

㉜ 董珊:《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文物》2004年第8期。

㉝ 张守中:《中山王髹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年。

㉞ 吴振武:《赵二十九年相邦赵豹戈补考》,《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

㉟ 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108页,齐鲁书社,1982年。

㊱ 张德光:《邳皮戈考》,《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㊲ 此戈铭文只有摹本,或有学者将“堂”释读成“尚工”二字,以之为赵国兵器铭文铸造者称“工”的第二例,笔者不赞同此说。

㊳ 张德光:《关于邳皮戈的补议》,《文物季刊》1997年第9期。

㊴ 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收入氏著:《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

㊵ 马非百:《云梦秦简大事记集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㊶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㊷ 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

(特约责编:徐义华)

这次宗教尝试,很快结束。但其意义是不应忽略的,而且改革的原因是王权与神权的斗争,本身即是一神教产生的可能途径之一。应该加以关注。

### 三、《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

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斤”地的地望。“斤”是记载昭王南征相关铜器中出现的地名,作者认为西周时期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是自成周过方城经南阳盆地到江汉流域的东线,鄂东地区有西周时期的城址和考古发现,这一地区又是周人为保障铜资源而重点经营的地区,而“斤”可以训诂为“蕲”。所以,“斤”应是今蕲春一带。

昭王南征是西周的重大史事,探讨“斤”等地名,不仅对于认识昭王南征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商、周之际,江汉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认识中国国家发展的阶段有裨益。本文的探讨,可以自细微处看大历史,很有意义。

本文通过西周时自周至南方的交通路线、周人向南方开拓的目的、鄂东的考古发掘以及文字训诂方面进行认证,其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应该看到,相当的证据是间接的。如果资料具备,可以加强直接证据的扩充,将金文或文献中与“斤”相关的地名一同讨论,用多点确定一点。同时,我们还看到铭文与昭王征楚有关,所以从楚人的早期历史和地望出发,也是一条加强论据的方法。

### 四、《闻尊铭文与西周时期的采邑制度》

本文利用新出《闻尊》中“𡵓(胥)朕采瘁田、外臣仆”的记录,认为“𡵓”字意思为“主司、治理”,“𡵓”字后之“采”、“田”、“外臣仆”应为并列的宾语。而“瘁”字可读迓,表示近义,瘁田即近采之田。外臣仆,则是采邑从事劳动之民。

在此释读基础上,结合《鼎》、《中方鼎》、《静方鼎》中关于采邑的记录,总结了西周时期采邑的地域范围、赐采的原因、采的功能与性质、采的等级以及采的内部结构等特点。

本文许多观点,已经为前人的成果所证明,是可以采信的。本文的最新突破在于采的内部结构,如果采、近采之田、外臣仆等关系得以确认,那么对于认识西周社会结构和西周史实有启发意义。正因为具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应该加强讨论。瘁田,释近,虽然有一定根据,但尚缺乏同字其他例证。另外,采与瘁田是否确定是并列关系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二者之间也可能是同位语关系,即瘁地之采田。臣仆的内、外关系涉及西周的社会性质,也十分重要。从相关资料看,西周贵族的采邑有时不止一处,且高级贵族封地和采邑可同时并有,所以内、外关系上,就有多种可能。

### 五、《赵惠文王时期的纪年兵器研究》

本文通过对二年主父戈、王何立事戈、廿年丞闾相如戈和廿九年相邦赵豹戈等多件赵惠文王时代的标准兵器进行讨论,认为在赵国兵器刻铭的演变过程中,由早期形式多样的辞铭发展到后期严密规整的三级辞铭格式,惠文王在位时期是这一变化的关键阶段,奠定了孝成王及以后赵国兵器刻铭的一般形式。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崇尚武力和战争拓疆在当时是新的现象。而赵、秦等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以制造武器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上及国王下及奴隶,是认识当时社会性质和变迁的重要内容。本文虽讨论的是具体事物,但以小见大,可窥战国历史。

(王宇信)